

清末的移民政策与麦都思译《海岛逸志》研究

侯杰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传教士麦都思于1849年翻译了清末王大海的史地旅游笔记《中国人在海外》(*The China Man Abroad*) (原名为《海岛逸志》), 刊载在上海墨海书馆主编的《中国杂志》上。《海岛逸志》的翻译反映了清末闽人东南亚移民热潮及清政府对移民政策的变化。探讨《海岛逸志》翻译的文化背景及翻译策略, 有助于还原清末华侨对东南亚史地的认知状况, 挖掘中华典籍外译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海岛逸志》; 翻译; 清末移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 H059; K107

王大海, 字碧卿, 号柳谷, 福建龙溪(今龙海)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王大海登爪哇岛, 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完成《海岛逸志》, 而该书最早的刻本出现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此后各种刻本流传世间, 最有名的是“漳园本”(简称“漳”本)。该书详细记载了爪哇岛屿及马来半岛的国家、民族、历史、民俗、物产、交通以及当地华侨的生活状况, 是研究东南亚史、外交史重要的史料文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英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将全书译成英文出版(全名为: *The Chinaman Abroad: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ago*)外, 似尚未见有人加以整理问世, 海外学者甚至没有见到中文本而往往引用英文本。”^[1] 麦都思(1796—1857)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 他于1835年抵达广州。麦都思1835年以前曾在马六甲和雅加达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没有史料记载在此期间他是否接触了王大海的《海岛逸志》, 但“混迹”于马六甲及爪哇岛一带十余年, 他对爪哇岛一带史地状况无疑是十分熟悉的。麦都思在序言中把翻译目的归结于“能使东西方世界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with the view of bring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 into a better acquaintance with each other)。”^[2] 实际上, 他的翻译行为与当时福建居民移民东南亚热潮及清廷移民政策的变化关系密切。本文比较参照了《海岛逸志》香港学津书店1992年校注本和1849年刊载在

《中国丛报》(*Chinese Miscellany*)上的麦都思译本。

一、清末闽人移民东南亚的热潮及移民政策的变化

清末的自然灾害, 如台风、水灾、地震及海潮等对福建地区的侵袭频繁。福建人口的激增及有限的耕地面积迫使福建居民“奔走外洋, 披星戴月, 不辞跋涉之苦, 别祖离宗, 只为膾粥之计”^[3]。

与王大海同时代“闯南洋”的闽人不在少数, 而在鸦片战争以后, 闽人移民海外的人数逐渐增多, 这与资本主义的入侵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 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破坏了福建的原生自然经济。五口通商以后, 洋布、洋油及洋糖等工业化产品在福建的大中城市兜售, 福建的农业及传统手工业遭受重创, 农民及手工业者不得不另谋生路, “跑海路”的人越来越多。其次, 西方列强在华掠夺廉价的劳动力,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 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量输入华工至本土。清政府被迫接受列强的不平等条约, 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契约华工”。英国、荷兰统治下的东南亚“南洋”诸国推出一系列优惠置业政策, 吸引了大量华工, “晚清到民国时期下南洋, 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4]

更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政府政策变化造成的“内部推力”, 加速了“下南洋”人口的激增。

收稿日期: 2018-11-01; 修回日期: 2018-12-03

作者简介: 侯杰,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及比较文学。

E-mail: houjie0918@163.com

引文格式: 侯杰. 清末的移民政策与麦都思译《海岛逸志》研究[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4): 6-9.

清朝统一台湾后,对外贸易活跃,清廷1684年废除了“海禁令”,设立海关。厦门成为港务繁忙的港口城市,大量的福建人随贸易船直下南洋,清朝福建籍官员施琅写道“数省内地(福建尤甚),积年贫穷,……实繁有徒,乘此开海,公行出入。”^[5]海外华人反清斗争日趋激烈,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雍正二十七年(1727年)再次解除“海禁令”。鸦片战争前后,为管理在华西方人士,禁止鸦片贸易,清朝实行严格的海禁令,只允许外来船只在广州特定区域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以后,国际法已经明确禁止黑人贸易,在西方工业国家劳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开始大量吸收华工弥补,大量华工通过非法走私渠道输出到国外。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荷、法、美、俄等列强都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利益,其中包括使清廷同意华工输出合法化,局部解除海禁。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凡有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法国)船只,毫无禁阻。”^[6]

1866年,英法两国又同中国签订招工章程条约,规定了招工的目的地、招工期限、劳工的每天工作时间及每年的工作日数、工资标准及医疗费用,并声明免收移民及其眷属从出国离岸到目的地的往返费用。清廷发布系列法规条款,明确宣布对自愿前往外国的中国人或中国移民,“概不禁阻。”^[7]其他列强,如法炮制。素来有“下南洋”习惯的福建地区,在移民合法化的刺激下,南下新加坡、马来半岛的人口激增。麦都思从1817年开始在马六甲经营印刷所及传教事务,后又在槟榔屿和雅加达一带活动。毫无疑问,麦都思汉学学养的养成,和他与当地华侨的接触是分不开的。见证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潮,亲历清廷对移民政策的变化,麦都思正是在1849年翻译了王大海的南洋史地游记《海岛逸志》。可见,麦都思翻译《海岛逸志》不仅反映了他提及促进中西交流之目的,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人移民东南亚高潮的预判,而这种移民潮的内部原因又是和清朝的移民政策紧密关联的。

二、麦都思译本的直译与深度翻译

麦都思译本基本遵循了直译的原则,尽力保留源文本的汉文化特色。对“漳”本中出现的地名等专有名词,麦都思采取先对照英语译名,然后在括

号里直接保留汉语,在其后注音的直译方式。在开篇《西洋纪略》之《噶喇巴》中,麦都思以地名“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为例,说明书中的地名都根据“福建话”(Hokken pronunciation)音译而成,因为作者王大海是福建人。所以,麦都思的注音都是根据所谓“《福建词典》”的拼读法而来的。例如,Batavia(噶喇巴,Kat-la-pa),A-moy(厦岛Hay-tó),Malacca(麻六甲,Mwā-lak-kǎh)等。对于原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麦都思大都采取了音译,个别无文化差异的词汇直接翻译成英语,有文化差异的词汇在相关注释中加以解释。

大部分译文,麦都思虽然恪守直译的原则,但直译中不乏“意译”之处。译者麦都思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史地学家,也是一位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家,对《海岛逸志》中涉及到的“风物”的理解十分到位。例如,在卷四《山海拾遗》(*Miscellaneous Matters*)中,译者没有将“五行”翻译成中国的金木水火土,而是翻译成了“气候和季节”: climate and seasons。这种意译主要是根据原文语境推断而来。

王大海原文:

吧国在西南,气候迥异,昼夜之短长,潮汐之早晚,皆与内地相反,春雨夏旱,岁以为常。风则朝南暮北,来往乘之。夜则北斗以下诸星沉没不见,而南方星宿倍见明亮。朔望不常,缘不置闰月也^{[1]92}。

麦都思译文: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the climate and seasons differ; the length of the days and nights,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ides, are the reverse of our inner land (China). In the spring there is much rain, and in the summer, drought; every year it is the same. The wind in the morning blows from the south, and in the evening from to the north, of which voyagers take advantage. At night all the stars north of the great bear are invisible, while thos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re doubly bright. Europeans do not distinguish the new and full moons, nor do they supply intercalary months^{[2]41-42}.

文本比较可见,麦都思对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整体”观有较深刻的体认。由原文可知,此处的“五行”代指万物相联系中的“气候”、“时令”甚至“天象”,所以麦都思翻译成“气候和季节”大体上是合适的。在卷五《闻见录》(*Other Things Worthy of Observation*)中,麦都思把“量天尺”直译成“Heaven-measuring Rule”,对译成英语“Quadrant(象限仪)”,让英语读者在理解含义的

情况下也保持了汉语的文化特色。这样的例子还有“天船”直译成“Celestial Boat”,对译成“The Balloon”,“指南车”直译成“south-pointing carriage”,对译成“the Mariner’s compass”等等。有时麦都思也有误译或含混之处,例如,第二卷《人物考略》(*Some Account of Celebrated Persons*)提及到“圣墓港”,麦都思只是直译成“Holy Grave Canal”,没作深度解读。实际上在卷一王大海已经提及“圣墓”,“又万丹有一大石碑,写字乃唐人明朝圣墓公”;源自中国典故的“得月楼”被麦都思译成了“the Moon gallery”,“得”字丢了^[8]。卷四之“尿婆”一词条,指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海鸟,不知为何,麦都思漏译了此词条。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是由加纳裔美国学者阿皮亚(K. Anthony Appiah)提出来的,是指“一种学术性翻译,主要使用注释(annotations)或者附带性注释(accompany glosses)把文本放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之中进行阐释”^[8]。这种技术性的翻译尽量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内涵,使目标语读者能更深刻地体味源语民族的文化及思维特征,体现了目标语对源语文本的充分尊重。中国古籍外译,应当充分重视外译作品中深度翻译技巧的运用,挖掘这种翻译策略的优势或不足,以利于更好地表达中国古籍蕴含的文化信息。纵观麦都思译《海岛逸志》,“译者序”、文内保留汉语原文、文内脚注、图表等深度翻译形式,都可以看法国叙事家Gérard Genette所谓的“文内副文本”(peritext)。这些副文本的存在对深度传达汉语的文化信息,使得英语读者正确理解原文的含义,领会汉语的文化特色,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在“译者序”(Translator’s Preface)中,麦都思承认王大海是“一位富有学问和观察力的人”,但也指出某些曲解和偶然的错误是由于作者个人习惯或者资料不全造成的,认为书中王大海对于欧洲人的“奇特”的描述,“也许会使西方读者感到有趣,也可说明中国人对外国的想法”:

The singular representation given of European habits and manners will perhaps contribute to the amusement of western readers, as serving to sh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 of foreign nations^[2].

麦都思学养深受西方科技的影响,在译文中指出了王大海的许多常识性史地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但序言中以西方人“观”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奇特”理解,也略带有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好奇感。从整个序言看来,麦都思认为王大海的许多说

法表达了“不少善意和好感”,最后说明他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东西方更好地相互了解。

其次,译文中保留的汉字多是人名、地名或者汉语典故等专有名词。对于这类名词,作者有时候把对应的英语先译出,置于汉语名词之前,然后再用“福建音”拼写在汉语名词之后;有的名词不能译出的,只有汉语与其“福建音”拼写。对于需要解释的名词,麦都思有时在名词后的括号内解释,需要较多注解时,在文内加脚注。实际上,许多近代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古籍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例如:“The Hollanders(和兰劳 Hō-lān-lā) are called by the Chinese 和兰 Hō-lān; and the general appellation bestowed upon them is Tuan(缎 twān) or master. The Dutch, in their turn, call the Chinese 秦 Chin, or as a general designation, Keae(稽 kīe), Sir.”^{[2]28}“蛇嶼 snake island”加“+”进行脚注“*This refers to the Boomtjes, a small island surrounded by rocks.*”^{[2]21}对专有名词而言,这种做法保留了汉语原文的准确性;特别是对于负载文化含义的词汇的直译和意译的结合,能尽量向英语读者展示汉语的文化特色。

再次,麦都思往往用文内脚注处理原文的一些史地误解或曲解,或者中英有文化差异的地方。对于“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约一万四千里可到”^[1]这一句,除了直译,麦都思在页内注释,指出王大海的史地常识错误:

About 250 le go to a degree, which would give as the distance 56 degrees; much too large a calculation: showing the Chinese writer’s ignorance of geography, as well as the slowness of junk sailing^{[2]21}.

(二百五十里跨越一“度”,这样算起来就有56“度”,算得太多了。这显示出中国作者对地理学的无知,也说明了货运航行速度之慢。)

三、结语

《海岛逸志》的翻译反映了华工“下南洋”的时代背景,而这种时代背景又和清朝的移民政策紧密相关。麦都思来华期间,正值中国遭遇两次鸦片战争。战争促使中国修改中国海外移民及海禁的法令,客观上促进了海外移民的激增,麦都思在1849年翻译《海岛逸志》无疑觉察到华工“下南洋”的移民现象。通过译本分析,可见麦都思是一位史地知识丰富、汉学修养深化的汉学家。在翻译《海岛逸志》的过程中,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专业知识和汉语文化知识,既保留了古籍的中国文化特色,又较

为准确地向英语世界读者传达了原文信息。不可否认,正如汉语版校注者姚楠所述,麦都思对王大海的原著理解也有曲解之处,姚楠等学者又进行了一一订正。探讨《海岛逸志》麦都思译本的官方政策时代背景、翻译方式及翻译策略,有助于丰富中国古籍外译的研究内容及翻译策略,也有助于挖掘《海岛逸志》的外交史。

参考文献:

- [1] 王大海. 海岛逸志 [M]. 姚楠, 吴琅璇, 校注. 香港: 学津出版社, 1992.
- [2] MEDHURST W H. The Chinaman Abroad [J]. Chinese Miscellany, 1849(2): 21-28.
- [3] 庄为玑, 郑玉山. 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1109.
- [4] 高荣伟. 下南洋: 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 [J]. 寻根, 2014(4): 139-142.
- [5] 施琅. 论开海禁疏 [M] // 贺长龄. 经世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045.
- [6] 贾桢. 筹办夷务始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506.
- [7] 陈达. 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 [M] //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1.
- [8]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 [J]. Callao, 1993(4): 808-819.

Research of Immigration Policy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hinaman Abroad Translated by Medhurst

HOU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Ong-Tae-Hae's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ese Miscellany magazine with the name Chinaman Abroad, by Walter Henry Medhurst.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reflected Fujian natives' emigration boom to Southeast Asia and some changes in immigration policy of Qing government.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by Medhurst, 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and promote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masterpieces.

Key words: Chinaman Abroad; transl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 late Qing Dynasty